

伤寒杂病论会通

黄竹斋 撰述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印

一九八二年

《伤寒杂病论会通》校点说明

《伤寒杂病论会通》一书，系我国已故著名中医科学家、长安黄竹斋先生对白云阁藏本木刻版《伤寒杂病论》所作的整理、校勘、注释本。该版本为民国以来发现的《伤寒论》四种古本之一，其内容较宋本多三分之一，且纠正诸本错讹之处不遑枚举。黄老先生在早年撰著《伤寒杂病论集注》、《伤寒杂病论新释》、《经方药性辨》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又取诸本相互校勘，补其缺略，正其脱讹，并采集中外二百余医家和医著注释之精华，汇众流而为海，合百虑为一致，条分缕析，折衷至当，务期无疑不释，无义不晰；在当时诸种困难条件下，不辞劳瘁，毅然自撰，自写，著成《伤寒杂病论会通》凡五十余万言；并购置旧石印机一部，自印自订，于一九四八年印行公世。黄老在该书按语中，贯穿古今，独述心得，尤其是所撰“三阳三阴提纲”，发前人所未发，阐“三阳三阴钤百病”之微旨，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发行后即受到海内外同道的注意和赞赏，惜当时因经济条件所限，只印二百部，流传不广，且至今已历三十多年，该书散佚，亦复成为罕见之本；端赖我院党委大力贯彻党的中医政策，重视祖国医学的继承、发掘与整理提高工作，且喜老中医米伯让研究员嗣黄老之学，保存一部。今为继承发扬仲景学说以及介绍黄老先生的学术经验、治学精神，鼓励后学，慨然献交我室为之校点重印，以供广大中西医务人员学习、研究、参考。

在校点整理过程中，我们作了以下工作：

（1）为适应印刷条件，将竖排改为横排；各方中原“右”字则相应改为“上”字。

(2) 按国务院正式颁行的汉字简化方案，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但个别具有特殊医学意义者，仍保留原字，如“癥瘕”的“癥”字仍用原字，而不改为“症”字。

(3) 全文进行了断句和标点。并将注文按医家或医著的不同内容分段排列。黄老先生自注，若并列有其它医家的注文，则在文前加“按”字，以示区别；如系独述，则未加“按”字。

(4) 对因当时印刷技术如油墨脱落、纸质低劣等或其它客观条件所致的个别词字错讹或引文衍误之处，分别参考黄竹斋先生所撰、人民卫生出版社印行的《伤寒论集注》、《金匮要略集注》及本书所引有关医家原著进行了校勘。

(5) 对本书所涉及的医家及所引参考书目，分别作了简介；同时编了方剂索引，一并附于卷末，按笔划顺序排列，以便读者查检。

(6) 为保持原书本来面目，凡书中切音部分及其他内容，悉遵旧貌，未作改动。

(7) 书前增附米伯让研究员珍藏的医圣张仲景和南阳医圣祠以及黄竹斋先生等有关照片十七帧。

古人云：“校书如秋风扫落叶”。由于我们的学术水平有限，虽然作了此项工作，可能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同道予以批评指正。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医史研究室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

重印《伤寒杂病论会通》序

夫医者，治也。医之为道，与农同源，与政相通。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民病饥则以食治之；民病身者以针药治之；社会不良风气侵袭之，上下不宁，则以政治礼乐刑赏法制以治之。医学乃寿世寿民之学，关系人民之寿夭，国家之盛衰，种族之强弱，人民之生、老、病、死、苦，无所不包。吾人应如何重视其学以精其业，是其首要之图。学医者，必先明学医之志。学医为何？为何学医？而吾医之志者，志在忧乐。宋·范仲淹文正公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忧者，忧天下人民或遭受饥馑，或遭疫疠流行，或遭方土为病，或受意外灾害，死于横夭，而不得其有效之法为之预防，苦无良好之医药而为之救治，宜应早为图治预防灾害，是其先天下之忧而忧也。迨人寿年丰，疫疠消灭，人体康强，国泰民安，此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医者临证首先虑其如何能得至当诊治之法，不使人民遭受横夭，是医者之责也。经治后，应详察病情是否根除，如何善后疗养。但病虽愈，尚须察其病情有无杀机内伏，死灰复燃之兆。务必绝其根株，使其机体调达，而致血气和平，人体康强，如治国然。可见范公之言其意颇广，非仅言于政而与医药无关矣。《国语》曰：晋平公有疾，秦景公使医和视之。赵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可见医学不仅是一门自然科学，实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之一门综合科学也。一九八一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发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呼声。党和国家于当前发出此种呼吁，发人猛省。吾辈医者是否能逃却其责？既知不能，即应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志，加强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以精研其本职之业，提高医疗水平，端正服务态度。关心国家兴旺发达，解除人民疾

苦，以济世活人之心，精研祖国医学。如何为四化建设服务，此亦“先天下之忧而忧”者也。

凡学医欲探其渊源者，必上溯《灵枢》、《素问》、《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欲穷其流者，必究《脉经》、《肘后》、《甲乙》、《千金》、《外台》、《诸病源候论》及唐、宋、元、明、清以至近代诸家学说，方知祖国医学发展之历史和规律及其独特之理论体系。不能温故，焉能创新；不能继承，如何发扬。若欲发扬祖国医学，必先做好继承工作。今重印《伤寒杂病论会通》一书，是为大家共同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研究仲景学说而为之。

我国东汉医学科学家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一书，法律严谨，方药著效，历代医家莫不奉为圭臬，吾人欲探《灵枢》、《素问》之奥，必应学习仲景之书，否则不得其门而入，何能得以探源寻流也？今有诋毁中医只能治慢性病不能治急性病之谬说者，何也？因其不研读仲景之书，不知《伤寒杂病论》为何物故也。伤寒者，为外感时令流行之急性传染病之总称。杂病者，为诸脏腑器官病之总名。能否深刻领会该书之精湛理论，并可在实践中正确应用，为衡量每一中医学术造诣和医疗水平的主要准则。

仲景生于炎汉之季，当时军阀割据，疫疠流行，在其书自序中发出无限感慨和痛切之呼吁，愤恨士人之流，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不精究医药方术以济世活人。并对当时医者在诊断和治疗中之草率不良作风与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不求改进之思想予以严肃的批评。又悲家族遭患疫疠所伤死亡之众，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毅然致力于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自己实践医疗经验，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科学地总结了周秦以来医家诊治疾病之经验，系统地归纳了各种病证发展变化之规律，制定了诊断疾病之标准和制方用药煎

服用量之规范。以天人合一，气化六元之整体观，提出三阴三阳为钤治百病之纲，为后世医家别开生面。从此奠定中医辨证施治、理法方药、四诊八纲发展之基础。其书是以病因学、发病学、治疗学三者融合为之论集。数千年来，其理论与效用一致，并经亿万病例之实践验证，至今仍指导着临床治疗实践和科学的研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性，中外医家莫不公认为经典著作。惜该书行世不久，即遭兵燹散失，幸赖西晋太医令王叔和之校摭编次，为三十六卷行世。不久遭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原文物板荡，王氏编次之书复遭散失。迨至隋唐时期，以中医科学家孙思邈述古之殷勤，年逾百岁方见《伤寒论》，载于所著《千金翼方》第九、第十两卷中，因当时印刷术尚未发展，书皆用竹木简或丝绸书写为卷，且互相传抄，故分卷不一。至唐天宝时，中医科学家王焘撰《外台秘要》四十卷，分一千一百另四门，又《外台要略》十卷。今《要略》佚失。《秘要》中张仲景《伤寒论方》，注出卷数至十八，内有《金匱要略》诸方，盖王焘所见者又一别本。旋遭安史之乱，弘文馆被焚，幸赖王焘所撰《外台秘要》得以幸存，至今成为考证我国唐代以前医书之旁证材料，诚可宝贵。此外，仲景之书见于梁《七录》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隋书·经籍志》载《张仲景方》十五卷，《唐书·艺文志》载王叔和《张仲景药方》十五卷、《伤寒杂病论》十卷，以上所载之书均已不存。五代时，刻版印刷术始盛行，至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朝廷命高保衡、孙奇、林亿等人校刊医书，认为“百病之疾，无先急于伤寒”，故先令将宋开宝时节度使高继冲所献之《伤寒论》十卷，校定刊行（开宝为宋太祖十年之年号，即公元968—976年），然杂病未见其书。而宋仁宗时（公元1023—1063年），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佚文，名为《金匱玉函要略方论》三卷，据林亿校刊序云，该书内容为“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总数家耳。尝以对方对证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校

刊时将其有关《伤寒论》条文删去，仍分为上、中、下三卷，亦于同时刊印。即今之《金匱要略方论》。此外，尚有《金匱玉函经》八卷，为《伤寒论》之别本，该书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其义皆通圣贤之法，故并两存之。依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于宋治平三年亦校刊印行公世。此仲景遗书自汉建安十年以来至宋治平三年，上下八百多年中分合隐现之概况。从此以后，仲景之书始普遍流行。旋遭靖康之乱，金陷汴京，文物又遭散失。今世所传之宋刊本《伤寒论》十卷，实为明万历二十七年岁次己亥三月时，虞山赵开美校刊翻刻本，总二十二篇，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方匱要略方论》上、中、下三卷，乃明万历十三年徐鎔校刊本，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者合二百六十二方。而《金匱玉函经》八卷，为宋馆阁秘本，亦遭散失。虽元代医学科学家朱丹溪对医学之精通，明代医学科学家王安道之淹博，盖皆未见此书，至清康熙五十五年，上海陈世杰得手抄宋本，与何义门鉴定刊印。解放前该书在南京某图书馆仅存一部，为稀世之宝，先师黄竹斋先生不辞劳苦，亲往抄之，今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发行，为医界之一大幸也。关于仲景之佚书，如《宋史·艺文志》载《张仲景脉经》一卷、《五藏营卫论》一卷、《疗黄经》一卷、《口齿论》一卷，今尽皆佚失。此外，仲景之书见于《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者，吉光片羽，足资考证。仲景之书，承其绪者，历晋迄唐仅有王叔和、孙思邈二人遥相祖述，然皆传述其文，而少所发明。自赵宋以后，注释渐众，盖已无虑数百家矣，对仲景学说之应用研究出了不少名家，如韩氏和、朱肱、庞安常、许叔微、郭雍等，其师法研究仲景学说各有独特见解。然注解《伤寒论》最早者，首推金·成无己。因成氏距宋治平时代不远，附加己意，故《伤寒论》有“成本”、“宋本”之分。《金匱要略方论》注解最早者，首推元·赵一德。赵氏所注《金

匮玉函经衍义》实《金匮要略》之变名。明清以来注释《伤寒》、《金匮》者，大抵皆以林校及成、赵二书为兰本。自明代医家方中行认为仲景《伤寒论》为王叔和编次错简，将经文打乱重订编次，其后喻嘉言、程郊倩、魏念庭、柯韵伯诸家和之于后，任意颠倒，愈排愈乱，使读者无所适从，难以得识旧貌。有以经络论六经者，如朱肱、汪琥；以六气论六经者，如张志聪、黄元御；按方类证者，如徐灵胎、柯韵伯；按法类证者，如钱潢（天来）、尤在泾；以经类证者，有沈目南、包诚等诸家为代表。惟浙江钱塘张隐庵、张令韶，福建长乐陈修园等医家认为经文不宜任意割裂，应维护旧论，使学者得窥全貌，陈修园遂本二张之义，著有《伤寒论浅注》；又取徐忠可、尤在泾之长，著《金匮要略方论浅注》；此外有《医学三字经》、《长沙方歌括》、《伤寒医诀串解》、《本草经注解》十余种入门之书，使学者得入正轨，易于理解仲景之书及诸家注释之得失。该书对启蒙推广引人入胜起到促进作用。陈氏有功医学诚非浅鲜。

自西洋医学传入我国，即有中西会通自然结合者出现，如四川彭县唐容川、江苏武进恽铁樵、江苏江阴曹颖甫、陕西长安黄竹斋、江苏川沙陆渊雷、四川隆昌周禹锡及许多名家，吸取外来医学之长，补我中国医学之短，拟用外来医学之实验手段，发扬中国医学之长，对研究《伤寒论》仲景学说，当时出了不少杰作，对我国医学之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揭示了中医许多陈陈相因医学术语之本质，我认为这是祖国医学之一大发展。但亦有些牵强附会者，并出现了一些对中医学术基本理论根基不深，诊治经验不足，失去继承发扬信心，反戈一击，弃中学西者；或滥竽充数者；或以学术偏见特权压抑祖国医学发展趋于低潮，甚至喧宾夺主者；或主张废医存药者均有之。我认为形色虽有多样，但对中国医学之发展毫无关重要。凡每门自然科学只要有其真实的科学性、强大的生命力，广大人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任何时代也是

不会被消灭的，它只能是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的发展完善。不过是总结经验，研究整理方法，及其所用之手段工具随着时代的推移有所不同而已。中国医药学确是一个伟大宝库，但有许多宝贵遗产尚未被人们认识发掘整理，如打开宝库之门有经冶炼而成之宝，亦尚有璞玉未经雕琢者，我们应当努力发掘，为人类造福。若欲发掘其宝，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艰苦之劳动代价方能得宝。否则，坐享其成，只有望洋兴叹而已！仅就书籍散失一事而言，数千年来或经私人秘藏而未发现，或被人偷盗，或经历史变迁遭受厄运而散失者，或流失国外者均有之。例如先师黄竹斋先生之著作，就我所知和八宝山公墓碑阴结论所记载者，先师著作约五十余种，先师歿后不知如何处理？北京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院长尤祥斋关心此事，欲与整理，告该院图书馆馆长耿鉴庭同志邀我查阅目睹先师著作在该馆仅存二十余种，完整大部著作仅有数种，其余皆以零碎札记充作种数，令人非常痛心！此不过仅仅二十二年时间，先师之书即遭散失，尚且如此，何况仲景之书经一千七百多年中多次遭受散失，分合隐现，其书卷数不一，虽经历代医家整理增删订正，仍未能窥知全貌，此即更不为奇。自民国以来仲景之遗书即有四种发现：1.湖南浏阳刘昆湘于民国初年为母丧求葬地遇张老者传授古本《伤寒杂病论》十六卷，计四册，于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何芸樵手书石印。其宗人刘仲迈与之同撰义疏印行。2.四川刘鎔经得于涪陵张齐五，据云：清咸同间得之于由垫江来涪之医士袁某，及得之于明代垫邑某洞石匱所藏者，为王叔和所述，孙思邈所校，亦名《伤寒杂病论》十六卷，计二册。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刘鎔经石印公世。3.桂林医家左盛德，当清同治三年（1864年）得其师张仲景四十六世孙张学正字绍祖者，授于家藏仲圣《伤寒杂病论》第十二稿手抄本，计四册，名为白云阁藏本，左氏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将该书授于门人桂林罗哲初先生，罗氏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将该书又授先师长安黄竹斋先生，历经艰

难曲折，于1939年由陕西辛亥革命将领张钫捐资始刻木版，经先师校刊公诸于世。4、日本·昭和丁丑(适当民国二十六年)，大塚敬节印行之康平本《伤寒论》。按日本康平，适当我国宋仁宗嘉佑五年，较宋英宗治平二年距时不远，亦系日人抄录传入日本。该版本一册于1948年由苏州叶橘泉先生铅印公世。以上四种发现，皆为研究仲景学术的重要参考文献。

《伤寒杂病论会通》一书，是已故我国著名中医科学家，先师长安黄竹斋先生于民国三十七年所著印行。先师原名黄谦，字吉人；又名维翰，字竹斋；晚号中南山人，又号诚中子。先师幼贫，出身铁匠，不能入塾就读，十八岁时始识字，从塾童而问学。由是发愤立志致学，抱负宏远，遂通经史、天算、地舆、历法、兵、农、医、药、理、化、儒、释、道、典、哲学等学，生平著述出版与未印者约计五十余种，尤精于医。尝谓“庶士以利人济物之志者，惟医为然”，乃毅然以发扬中国医学为己任，致力仲景学说之研究。先师平生致学之特点，论国学无汉宋门户之见，论科技哲理不分中西，研究中医在治疗上无论对经方、时方、土单验方、针灸、导引、内服、外治有效之法均用，接诊患者无分内、外妇、儿、伤科均能诊治。尝谓只要对病人有疗效者，有益于国医发展之科学均可学之。即对铃医、农民、樵夫、渔夫、僧、道、卖艺者，有治疗一技之长者莫不虚心请教焉。先师好游名山大川，爱作实际考察，访问历史古迹，搜集仲景佚书。尝谓致学不能固步自封，陈陈相因，勿以人之喜怒为喜怒，必须自辟蹊径，有所创新。对世俗所谓之功名富贵之认识见解，他认为：有补天地，曰功；有关世教，曰名；有学问，曰富；有廉耻，曰贵。先师肺腑之言使我永铭于心，拳拳服膺。当反动政府企图消灭中医时，他性情豪爽，不畏强暴，出于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主义思想，亲往南京向反动政府请愿、呼吁，援笔反抗，并与全国医药界在上海组织全国国医联合会，号召国内外中医药界同仁口诛笔伐，函电交

驰，迫使反动政府制定中医条例，致使消灭中医之阴谋未能得逞。并向国民党中央卫生署提案，为我国创办中医大学，亲自制定教学方案，并整理中医各科证治全书，写出整理方案，建议重修南阳医圣张仲景祠墓案，均不被采纳。先师在上海提议与医界同仁组织募捐重修南阳医圣祠董事会，首将自己所著印行之《伤寒杂病论集注》、《校订伤寒杂病论读本》各捐一百部，以资提倡。当时他的科学预言是：“中华古医学，世界将风行”，现已实现。当时他对国民党某权威说：“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医未能消灭，何况今日五洲交通，中外文化交流，谁能阻挡之。况世界学问非为私有，乃为世界公有，虑中医将绝者乃杞人忧天。”又愤慨言之：“今日中医之所遭轻视、歧视甚至或被灭亡者，非亡于西医之手，而是亡于中国执政者之手，亡于中医之手。若中医不思振奋，不精其业，惟有坐以待毙。其祸不在颛臾，而在萧墙。”

先师尝谓仲景仁术教泽，功被万世，论者推为医中之圣，然考诸《后汉书》、《三国志》无仲景传记，甚以为憾！乃遍搜诸家子集、野史杂记、历代名医评赞，撰成《医圣张仲景传》一册，该传首载于《伤寒杂病论集注》第一版。又十年经过增刊修改，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亲诣南阳拜谒仲景祠墓，计住七日，拓碑拍照，作实际考察，撰《拜谒南阳医圣张仲景祠墓记》，充实所著之《医圣张仲景传》。亲将崇祯五年园丁打井发现“汉长沙太守张仲景之墓”碑石拓页带往上海，请考古家鉴定，认为字体遒逸，类晋人书，为晋人所立之碑石。此次南阳地区张仲景学说研究会上又经耿鉴庭先生鉴定，与黄老当年鉴定无异；尤其碑座有“咸和五年”四字，按咸和五年为东晋成帝五年之年号。可见先师当年即已作此项工作，对仲景之人、之墓、汉长沙太守之职、医圣之谥，千载疑误，一旦冰释。而先师所撰《医圣张仲景传》，早年曾以单行本印行，后被日人冈西为人收入《宋以前医籍考》。先师对医圣张仲景所作之“传”、“记”，对现代研究考察

仲景佚事提供许多方便，有功仲圣诚谓伟矣。

先师毕生致力仲景学说研究，认为《伤寒杂病论》仲景自序云十六卷，由于历史变革遭受兵火所致散失，后世先后发现时期不同，又将该书分为二书，即现在通行之《伤寒论》、《金匱要略》，与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不符。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公元1907年），以西哲生理系统之说，撰解三阳三阴提纲，阐发仲景六经钤治百病之本旨，可谓发前人之未发。于民国三年（1914年）又取《伤寒论》、《金匱要略》合为一帙，仿陈修园浅注之例，撰成《伤寒杂病论新释》十六卷，可谓自辟蹊径，务去陈言，卓然成一家言。嗣又纂集中外诸家注释之精华，删繁去芜，撰成《伤寒杂病论集注》十八卷，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出版印行。是书并经实践增删修订，又于民国二十三年三版印行，首列所撰《医圣张仲景传》、《通论》、《三阳三阴提纲》于卷端，早已风行海内外，脍炙人口，得到南方许多医家之很高评价。如《中国医学大辞典》主编谢利恒先生为之序云：“西安黄竹斋先生重印《伤寒杂病论集注》十八卷，都七十余万言，据生理之新说，释六经之病源，贯穿中西，精纯渊博，可谓集伤寒论学说之大成，诚医林之鸿宝也。”又在《医学源流论》中称为“近今之杰作”。在《陕西通志》亦早载入。江苏武进张赞臣先生云：黄竹斋先生以汉儒注经之精神，而又不辞辛苦，海内奔驰，作实际之探讨，著《伤寒杂病论集注》，诚于仲圣绝学有羽翼之功，方其书再版爰题“医学渊府”四字，藉志钦慕。此外，南方诸中医学家，如福建陈逊斋、浙江宁波周岐隐、南京周柳亭、四川隆昌周禹锡、陕西兰田学者赵和庭、兴平赵玉玺、古越裘吉生、江苏如皋黄星楼、苏州叶橘泉诸学者均为之序予以很高评价（见《伤寒杂病论集注》）。先生还撰有《经方药性辨》、《伤寒论类编》、《伤寒类证录》、《方剂类编》、《伤寒六经提纲歌》、《校订伤寒杂病论读本》、《本草考证》等书。

先师在医学方面不仅对伤寒学说有创新研究，且对《内经》、针灸学说同有深刻研究。于民国初年，著有《针灸经穴图考》八卷，以十二经为纲，三百六十五穴为目，科学地总结整理了中国针灸学，早已印行，风行海内外。附以奇穴拾遗，经穴图谱以正常人体点穴摄影，制铜版印行，是其独创。又以病证为纲，以针治取穴疗效为目，著有《针灸治疗会通》八卷。对《内经》之研究著有《内经类编》四卷。厘为五纲，一曰天运气化，二曰人体生理，三曰病证源候，四曰望、闻、问、切，五曰针法方治。每篇各分目若干，供读者得其要领，别其真伪，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以为初学渡津之筏。以中医理论系统整理《中医生理学》三卷，《难经会通》附秦越人事迹考、难经注家考，校订宋·王惟一《铜人俞穴图经》，编撰《针灸经穴歌赋读本》等书。拟整理《中医各科证治全书》一百卷，以病症为纲，已脱稿二十卷，包括《儿科会通》八卷。其他著述积稿盈尺。

先师曾发愿搜罗仲景佚书，贡献医林，不辞劳苦，四方奔走，每发现仲景佚文必追踪到底。于民国二十三年往鄞访求仲景佚书，经宁波名医家周岐隐先生介绍，得识桂林罗哲初先生授其师左修之得仲景四十六世孙张绍祖所授家藏仲景《伤寒杂病论》第十二稿，较诸宋本、湘古本、涪古本、康平本，优异甚多，认为长沙佚文重光于世。于民国二十八年捐资刻版，限于经济条件，该书先后只印二百五十部，于民国三十六年岁次丁亥孟春，撰《祝告医圣文》，率余再诣南阳拜谒医圣，欲将此书播送海外，并送书版藏医圣祠。因时途梗阻未能如愿（历经三十多年之曲折，于去年始将书版送至南阳医圣祠保存）。先师遂又将所得罗哲初所授之《伤寒杂病论》第十二稿进行注释，又取各家不同版本之长核对订正，补其不足，搜集历代诸注之精华充实内容。本书遂以《伤寒》、《金匱》合为一帙，但终于辨妇人病脉证并治，以下而无杂疗方三篇，似亦未尽，遂以宋本《伤寒论》、正脉本《金匱要略》补其佚阙，务

期无疑不释，无义不晰，于民国三十八年脱稿卒成，命名《伤寒杂病论会通》，共计十八卷，分订八册。先师此时年已六旬有四，时当国内战争暴发，又受经济所限，余虑先师毕生心血一旦付之劫灰，殊觉痛惜！遂商同先师购买旧石印机一架，先师素性刚毅果断，爰笔亲书，自撰、自书、自印、装订而成。因受经济条件所限印数不多，分赠各地友人爱好者及各地省图书馆保存以供大家研究。先师以本书命名“会通”者，谓仲景之书多次增删变动，隐现分合，佚文散失不断发现，故本《周易·系辞》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之义定名；《周易本义》又谓：“会，理之所聚而不可遗；通，理之可行而无所碍。”先师借用“会通”二字者，望天下及后世之人，能将仲景之佚书进行搜辑整理，达到理会贯通，并非谓自著书中之所有问题，已达理会贯通之意，而不知仲景之学将尚有变动增补发现之义耳。余从先师游学有年，知其本义，望读者勿误解之。

此外，对宋本《金匱》杂疗方所列急救诸法及饮食禁忌两篇条文，先师认为有许多宝贵经验和理论是符合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不经之说，可能为仲景博采众方，收集民间传说，未经自己实践清删所遗之文，或为林亿校刊时收集民间传说补入亦未可知，故将此篇作为补遗，以俟来者研究。

先师在旧社会以个人奋斗精神，南北奔波，不辞劳瘁，历经艰苦，不屈不挠，不慕名利，素甘淡泊，又尝感慨吾国处于弱肉强食，瀛环鼎沸，列强并吞之势，为了维护民族尊严，慨然以昌明国学为己任，联合陕西诸学者创办日新学社，继之创办国学讲习馆，讲习国学以图学术救国。不幸世逢厄运，所遇维艰，俯仰环顾，无术救世。认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亦强国强神救世之一术也，故不遗余力，在继承发扬祖国医学上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为了发扬国医，救济伤员，抗日救国，曾整理

《中医伤科学辑要》三卷，并建议国民党卫生部在全国成立中医伤科训练班，设立伤科医院，以宏救济伤员；筹建陕西中医专科学校培植中医人材；筹建西京特效制药厂，以堵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筹建陕西天文气象测候所，以防御灾患，其志未遂。目睹国民党反动政府，政以贿成，官以邪进，驯致文酣武嬉，贪污成风，国魂已失，只存躯壳。遂偕余隐居长安樊川少陵原，筑土室居焉，其洞曰“乐素”。号称中南山人，诚中子，从事学术研究，并为广大群众治病。先师性情豪爽，生活俭朴，不畏强暴，不媚上欺下，致学严谨，言之必行，行之必果，每写一著作，必限期完成。先师学识渊博，一生在学术上不仅继承了南阳医圣张仲景和天文数学科学家张衡二家之学说，还对各家哲学颇有研究。在医学上对伤寒、针灸学说的研究则可谓自成一家。对张仲景三阳三阴学说所做之提纲，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天文学方面，著有《五纪衍义》，创制《北纬三十四度恒星平面仪》、《中西星名合谱》、《经天星座歌》、《修订国历刍言》、《测候所计划书》；数学方面，著有《求圆周率十术》、《微积分提要》、《邵子皇极经世图说考证》。在哲学方面，著有《周易会通》、《周子太极图说臆解》、《老子道德经会通》、《佛学考辨》、《命学考辨》、《堪舆源流一贯》；整理《扬子太玄经》、《孙子兵法》、《阴符经》、《诸葛武侯奇门遁甲》。他还搜集人生寿命在百岁以上者之资料整理为《寿考》一卷，以备研究长寿医学之用。还著有《孙真人传》（附《医学源流歌》）、《医事丛刊》、《竹斋丛刊》等书。

他的学术思想，要求不仅是重视理论考古的整理研究，更重要的是学术创新。他不仅是一位医学理论家，而且是一位临床实践家。

解放后，他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先师曾向我党中央毛主席上书，请将孔子《礼运·大同篇》纳入中学教材，以教育国人知吾国早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精神。并上书西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部长汪锋同志，请求保护陕西省孔庙之文

物，受到我党和政府之重视，被选为长安县人民代表，受聘为我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陕西省政协委员、对外友好协会理事等职。一九五四年，被邀参加西北医学院工作，任中医科主任。一九五五年奉命调往北京中医研究院任针灸科主任。受到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接见谈话。曾为卫生部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十五年远景计划提出意见书。并任卫生部针灸学术委员会委员。被评选为五好工作者代表，出席全国文教卫生工作会议。在京工作期间，哲学家艾思奇与先师为友，常作学术交流。印度尼西亚医界来函求购先师所著《针灸经穴图考》、《伤寒杂病论集注》等书。人民卫生出版社还将《伤寒杂病论集注》分为《伤寒论集注》、《金匱要略方论集注》出版印行。

先师主动要求中医研究院领导设置中医治疗中风偏瘫病床五十张于西苑医院，据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该院总结报告，题为：“针灸中药治疗中风偏瘫150例总结报告”，总计有效率91.3%。治愈病例不一一举例。其门诊和病房收治病人很多，有许多疑难危重病人经先师亲自治疗转危为安，疗效显著，博得群众的好评。先师对中风病有独到研究，针药并用，取得成绩，有些患者由担架抬来就医，经治疗健康步行出院，博得国内和苏联、民主德国、越南等国患者的称道。如曾治愈一位中风不语，半身不遂患者德国友人东布罗斯金，这一消息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报刊登载，称赞中国医学高明。当时苏联大使尤金患了瘫痪，经先师治疗，病愈后能行走，回国时宴请先师及院领导敬致谢意。中医研究院为先师拍摄了科教电影，拟应苏联邀请讲针灸学未遂。先师毕生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趣思如何为党的中医政策争气，无论在著书立说、临证治疗方面，处处都是在考虑党和国家的威信。他对重危病人只要有一线生机，总是设法抢救，从不考虑自己的成败得失，明哲保身。先生毕生致力祖国医学研究，自成一家。其治学之殷勤，实为我辈后学之楷模，真不愧为一位承先启后之中医科学家也。在临终前他还手不停披，